

## 美国撤兵阿富汗与中国西部面临的安全秩序

王 联

中国不仅是一个位于西太平洋沿岸的东亚国家,还是一个与中亚、南亚诸多国家保持长距离陆上边界的国家。环顾中国面临的周边安全环境,东部面临的冲突最为世人所看重,尤其是美国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不断落实,15年前喧嚣一时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论调<sup>①</sup>似乎快要成真。中美关系当然重要,但本文的重点不在此,而是尝试关注在西部边界地区中国所面临的安全秩序问题,特别是美国决定自2014年底从阿富汗撤军后,该地区局势发展对中国可能带来的安全挑战。

西部安全对于中国整体战略安全环境的重要意义无庸赘述。中国陆地边界尚未最终划定的,在西部(中印边界、中不边界);中国陆地可能面临敌对势力入侵的,在西部(中阿、中巴边界);要往中国渗透的激进宗教势力,在西部(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社会未来和谐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也在西部(疆独、藏独势力)。因此,考虑到中国经济和整体国力的持续稳定增长,切实维护西部边界的安全,是中国投身国际安全与维护世界秩序的重要一环。2014年底,美军预计将从阿富汗撤离。美国撤军后的阿富汗局势如何发展,伊斯兰主义势力是否会再度兴起,几个周边国家的动向如何,这不仅事关阿富汗局势的稳定,也是中国未来西部边界安全与否的重要考量依据。

中国东部面临的现实威胁在境外,西部遭遇的潜在威胁在境内;消除东部的威胁可以靠传统的军事和外交手段,面对的只是单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的结盟;消

---

\* 王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邮编:100871)

<sup>①</sup> Cf. Richard Bernstein, Ross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A. A. Knopf, 1997.

除西部的威胁则更多需要依赖双边和多边合作,面对的是多个国家、国际组织乃至非政府力量的压力。在中国未来拥有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后,更需要重视西部边界的安全,除了油气资源外,还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的侵扰。

## 一、美军撤离可能导致的阿富汗局势

就整体而言,中国的西部邻国包括四个中亚国家(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以及五个南亚国家(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但考虑到自然地理的屏障作用、上海合作组织的有效运作、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根深蒂固及中印关系的稳定发展,中国西部的九个邻国中,唯有安全局势动荡的阿富汗最有可能会成为从陆地通过人员渗透而影响中国西部地区安全的国家。“9·11”事件后,在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战场上,就俘虏了拥有中国国籍的恐怖分子,中国政府也自那以后陆续公开了1990年代以来西北地区发生的数起恐怖袭击案件,从而使外界对中国境内外恐怖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和利用的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在美军和国际安全部队的军事打击下,曾经活跃在阿富汗及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一度趋于溃败,中国西部边界安全也得到有效保障。

但是,随着2014年美军撤离的日益临近,国际舆论及研究者普遍不看好2014之后的阿富汗国内局势发展。塔利班势力的重新坐大已是不可避免,自2006年以来,除了坎大哈、赫尔曼德等中心城市及其邻近地区外,塔利班的势力逐渐控制了阿富汗南部和东南部普什图人聚居的省份。美国为此在阿巴边境地区开展的无人机袭击和越境军事打击行动,非但没能持久打击巴境内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宗教政治武装,反而招致巴基斯坦政府与军方的不满与反对,也不断刺激巴国民众的反美主义浪潮及反美极端主义势力的进一步抬头。因此,美国政府决定从阿富汗撤军,这一方面是国内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对动荡的阿富汗局势无能为力的反映。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随着美军和国际安全部队加快撤离步伐,以及塔利班势力卷土重来,阿富汗在2013—2014年将面临三大危机:(1)西方援助大幅减少后引发的经济危机;(2)卡尔扎伊任期即将结束而导致的政治危机;(3)2013年夏塔利班预计发动的新攻势带来的安全危机。<sup>①</sup>可以想象,早年苏军自阿富汗撤退后,任由纳吉布拉政权独自面对北方军阀和南方塔利班势力的夹击而迅速倒台的历史,未来几年内或将在阿富汗再度上演。只不过世易

---

<sup>①</sup> Gilles Dorransoro, “Waiting for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September 2012, p. 7,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waiting\\_for\\_taliban.pdf](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waiting_for_taliban.pdf).

时移,主角虽然不同,但政治变革的主题却未有改变,地方军阀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将再度兴起。一个动荡的地区局势,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阿富汗周边国家未来所共同面临的新挑战。

## 二、伊斯兰主义在阿富汗和中亚的蔓延或成必然

中东和中亚地区(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 MECA)的政治变迁贯穿整个20世纪。自从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瓦解以来,以中东和中亚地区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核心区就完全处在外部列强的掌控之下。从内部看,中东和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政治体制的长期僵化,二是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发展。无论能否成功推翻僵化的政治体制,都会必然带来政治形势的动荡,以及以政治伊斯兰运动为代表的各种宗教、部落和地方政治反对力量的兴起。体制外的政治抗争,最终往往会诉诸暴力和极端形式,恐怖主义得以滋生和蔓延。

当前中东和中亚地区的政治形势,主要以中东各国的政治动荡和中亚各国的专制独裁为主要特征。在急剧动荡或表面稳定的背后,各国政治反对力量蓄势待发。依据传统伊斯兰世界政治变革的基本特征来看,专制独裁政权被推翻后带来的“多党民主”,一定会使政治伊斯兰运动获得发展空间。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宗教政党赢取政权的主要支持力量。长期被拒于体制之外的政治反对势力,刚开始能够获得的群众基础无一例外地都来自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的支持。

就整体而言,中东和中亚地区是世界上民族成分复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较晚、传统部落和教派势力根深蒂固的地区。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在内的伊斯兰世界往往是以民族、部落或地区为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外宗主力量的交替征服和统治,以及内部伊斯兰统一外表的掩盖下,中东和中亚地区地区的民族、宗教对立延续下来。一旦外来主宰力量消失,以及内部威权势力瓦解,则政治变迁往往带来民族、宗教对立的凸显,这已成20世纪中东和中亚地区政治发展的一条规律。简言之,伴随政治变革的进程,政治伊斯兰势力或将进入公众视野和权力斗争的中心,成为影响乃至左右国家政治进程的主要反对力量。1990年代中期塔利班的崛起就是距今最新的一个例子,形形色色的宗教政党、宗教组织及其领袖大多成为中亚各国乃至包括巴基斯坦部落地区在内的极端主义政治运动和武装斗争的领导者。宗教离不开政治,政治更借助宗教而不断扩大影响。

历史上中东和中亚地区地区的政治变革,往往经历三个阶段:(1)发生推翻旧政权的人民革命;(2)新政权展开政治清算和确立统治基础;(3)宗教政治运动兴起,政局陷入动荡胶着状态。自1990年代初独立以来,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大体已经历上述三阶段的政治变革,目前处于伊扎布特等政治伊斯兰力量与政府对峙的阶段。阿富汗则极有可能步这两国的后尘,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已是恐怖主义

的温床。极端主义思潮及其在上述国家内的政治实践,显示了中国所面临的西部境外地区的安全局势不容乐观。

### 三、中国在西部边境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

环顾全球,欧洲各国在面对来自穆斯林移民的骚动时普遍反思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美国面临拉美裔移民对其传统的“瓦斯普”(WASP)国民性的稀释和冲击时,亨廷顿会发出“我们是谁?”的质疑。这些现象似乎表明,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正超越1993年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范式,而有可能成为未来制约国际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特别是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正通过个人及社会团体角色的增强而加大对当前国际政治发展走向的影响力度。美国在过去的11年来并没有打赢阿富汗战争,主要原因并非其没有坚船利炮,而是未能清除极端主义思潮存在的社会基础,未能彻底消灭作为非国家面目出现的极端主义分子。

对于恐怖分子、极端主义分子,或者深受其影响及其所存在的社会基础来说,国家军事和经济力量不足以在短期彻底根除这些问题。因此,观察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及中亚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时,我们可以看到东部基本上是以国家为对象,是传统国际政治的互动方式,大国外交似乎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是,西部地区更多是个人和社会团体为主要互动对象,反应出来的往往是文化或是宗教方面的差异性,面对的是一些中小国家的挑战。土耳其、沙特、卡塔尔在叙利亚局势演变过程中扮演的积极角色,以及给中国外交带来的压力,就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通过“阿拉伯之春”的进一步观察,我们也能看到年轻人口的激增,经济发展的持续边缘化,同时包括网络的便捷和推动,都使得个人和某些社会团体、宗教组织成为当前国际政治发展中的新兴行为单位。

2012年11月2日,在北京论坛的主旨发言中,英国科学院院长、牛津大学荣休教授亚当·罗伯茨也指出,寻求文明的和谐共存、共同繁荣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当人类对全球性问题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共同认识时,寻求共同的政治、文化、社会基础是实现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sup>①</sup>显然,中国西部邻国围绕各自文化而展开对话的时代尚未到来,不同文化、文明和宗教的差异在短期内不会减少彼此间的摩擦、隔阂与对立,相反,极端主义势力会利用这些异同而诉诸政治反对与武力对抗。如何避免境外的敌对思潮与组织向境内西北地区的渗透,应是中国政府确保西部边界安全的重要课题。

---

<sup>①</sup> 《北京论坛(2012)开幕:世界新格局下的机遇与挑战》,转引自北京大学新闻网, [http://pkunews.pku.edu.cn/spxw/2012-11/03/content\\_256490.htm](http://pkunews.pku.edu.cn/spxw/2012-11/03/content_256490.htm)。

美国自阿富汗撤军,将使阿富汗及其周边安全局势变得更加不可测。当中国面对2014年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基本局面时,中国在西部边境地区面临的战略安全上的挑战会大过美军驻扎时所带来的安全威胁。所以,这也是我比较同意王缉思教授所说的有关中美在中国西部境外地区可以合作的原因,<sup>①</sup>更不用说两国在伊朗核问题或者中亚地区反恐问题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必要性了。中国已经与中亚多国在当地建立起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框架,但是这个框架仍然是建立在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互动之上。对于恐怖分子、极端主义分子,或者深受他们影响及其所存在的社会基础来说,国家力量不足以彻底根除这些问题。

因此,中国面向西部地区的外交战略谋划,需要更多注重与有关国家的政府、人民、地区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交往,而不能仅满足于国家间、政府间关系的维系。因此,针对西部地区的特殊国际环境,中国应积极参与阿富汗的战后重建,与周边国家各阶层代表广泛接触,加强和发展中巴传统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改善和增进中印在地区问题上的磋商与协调,确保阿富汗国内局势平稳过渡。在伊朗核问题上,既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又坚持正当合法的双边贸易不受美国的干扰和阻挠。总之,在西部地区,对中国核心利益构成挑战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这三股恶势力。中国需要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同时借助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积极与周边国家开展行之有效的合作,大力巩固西部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边界安全,共同致力于一个稳定发展、合作共赢的西部安全秩序。

---

<sup>①</sup> 王缉思《“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载《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73期,2012年10月7日。